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丛书

李艳春 / 著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 城市适应性研究

Study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Peasant Labors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PEASANT LABOR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丛书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 城市适应性研究

Study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Peasant Labors

李艳春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 李艳春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1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885 - 0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女性 - 流动人口 - 研究
- 北京 IV. ①C924.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788 号

·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丛书 ·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著 者 / 李艳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胡 亮

责任编辑 /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85 - 0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将此书献给已经离我而去的母亲（1942.8~2011.9）。在其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中，她教会了我善良、理解、感恩与执着，正是这些品格使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以此为乐。

本书受“北京市协同创新课题”（第 1023 号）资助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导论	001
1.1 研究背景	001
1.2 研究意义	003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005
1.4 研究内容	025
1.5 研究设计	027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029
2.1 相关概念	029
2.2 相关理论	031
第三章 迁移动机	038
3.1 样本描述	038
3.2 迁移动因	044
3.3 迁移途径	051
3.4 迁移动因对适应性的影响	053
第四章 城市适应性现状	055
4.1 经济层面	057
4.2 社会层面	080
4.3 心理层面	098
4.4 城市适应的现实困难	118

第五章 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130
5.1 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130
5.2 居留意愿	133
5.3 个人特征	140
5.4 经济层面	142
5.5 社会层面	144
5.6 心理层面	146
5.7 综合模型	147
第六章 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 比较分析	157
6.1 居留意愿比较	157
6.2 个人特征	161
6.3 经济层面	165
6.4 社会层面	168
6.5 心理层面	172
6.6 综合模型	174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181
7.1 研究结论	182
7.2 提升城市适应性的对策及建议	184
7.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188
7.4 未来研究方向	189
参考文献	191
附录 北京市非京籍务工人员发展状况调查问卷	218
后 记	228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热门的领域（王章辉、黄柯可，1999：1~5）。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革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中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53亿，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4亿，外出农民工为1.68亿，本地农民工为1.06亿（国家统计局，2015）。

在诸多迁移目的地中，北京以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长久以来就对外来人口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迁移地。实际上，北京因其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北京市总人口为2152.0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18.7万^①，我们不难推算出北京外来人口之庞大规模。

在席卷全国的迁移浪潮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男性在流动人口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男性迁移人口与女性迁移人口的性别比是123.1，其中省内迁移性别比为

①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1/id/1779680.shtm>。

119.3, 省际迁移性别比为 139.1。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 0.1% 抽样数据推算, 女性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7385 万, 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段成荣等, 2009)。可以预计, 伴随城市化的推进, 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里的女性流动人口数量会快速增长。从国际上看, 女性移民也呈现相同趋势。非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 20 世纪移民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移民的女性化 (Crush and Dodson, 2010)。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 流入发达国家的女性移民数量已经超过男性。据联合国人口司估计, 2000 年全球移民女性占到 48.8%。迁移到欧洲和北美的女性移民比例分别为 52.4% 和 51.1%。2003 年进入美国的 70 万移民中有 55% 是女性。一些发展中国家 (如阿根廷) 女性移民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Sam & Berry, 2006: 408)。

以上事实表明, 中国出现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类似的迁移趋势。一方面, 计划经济体制倡导的就业平等使中国女性最大限度地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与就业机会, 劳动参与率非常高; 另一方面, 伴随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大城市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激增; 再加上家庭式迁移方式的出现, 在不久的将来, 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 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农村女性已经来到城市, 然而迁移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Liang and Chen, 2004: 425)。现有的城市生活研究没有对女性给予特别的关注, 性别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针对女性这一流动群体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更加有限, 她们的劳动价值往往被低估, 甚至被忽略 (杨云彦, 2001)。

事实上, 中国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同男性劳动力一样, 是社会变革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在付出青春与汗水的过程中,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她们离开家乡来到城

市, 如何适应城市是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2006 年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所说, “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过程,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尽早促进迁徙者在其居留的目的国融入当地社会, 符合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最大利益”(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2006)。因此, 如何让这些外来者尽快适应城市, 使其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 不仅是党和政府应该关注的, 也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

1.2 研究意义

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现象, 是社会经济因素与性别相结合生成的一种现象 (Chant, 1992; Bravo-Ureta et al., 1996; Dang et al., 1997; Yang and Guo, 1999; Kanaiaupuni, 2000, 转引自 He and Gober, 2003: 1221)。女性农民工在大都市工作、生活的适应状况, 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农民工自身生活的改善密切相连。她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得如何, 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就业及相关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 也关系到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大局, 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伦斯基在论述农业社会特征时曾说过, 与有文化的少数和无文化的多数之间的文化分化相并行的是将城市少数和乡村多数分开的一种分化, 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此不同, 以致在一种典型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在突然遇到另一种社会中哪怕是最普通的问题时也会显得十分愚蠢。这使得关于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乡巴佬”和在乡村显得迟钝的“城市傻瓜”的笑话越来越多 (伦斯基, 1988: 234)。因此对大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以女性农民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 可以丰富相关社会学理论。

性别是理解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视角。广义上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大多是以男性中心、依据男性经验建立起来的,而针对女性的理论有待进一步拓展:功能主义在解释男女差异方面似乎能力有限,经验主义把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将性别因素抛开,而女性主义理论自身还不足够发达(Pedraza, 1991: 305)。传统研究假定男性和女性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里,将男性经验和立场作为普遍知识的一种代表,从中概括出来的普遍性对于所有参与者都同等适用,女人被系统地排斥在知识体系之外而被迫保持沉默。因此,以女性农民工这一独特群体作为对象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现有的相关社会学理论,而且可以更好地反映女性在社会世界中的独有经验。

1.2.2 现实意义

首先,基于女性视角展开研究,可以更好地关注这一群体。事实上,女性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同于男性,而且二者在生活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相较于男性农民工以及本地女性劳动力,女性农民工的外地人、文化水平较低以及来自贫困地区等诸多标签,使得该群体不仅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地位方面也处于弱势,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处在底层位置,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其次,基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以及社会现象。城镇化或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必经的阶段,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迈进的必由之路。在这条必由之路上,女性在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消费和社会治安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家庭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成为进城农民与乡村社会联系的关键。外来女性能否成功地适应城市生活,不仅关系到女性劳动力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城市化实现的

程度,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与和谐,因此成为构建和谐和谐社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李树苗等,2008)。针对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农民工研究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

最后,在北京建设国际型大都市的背景下,对北京外来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况的了解以及居留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发现她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当前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农民工相关政策,保障青年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加快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对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外来劳动力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其中,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最早关注农民工性别差异的是李树苗,其于1993年发表《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研究》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谭深研究员自1993年开始从事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研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研究”项目(1993~2000),著有《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她的研究从性别角度关注打工妹的处境、经历以及态度形成的性别因素。

进入21世纪,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适应等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政府、公众及学者的高度关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学术研讨会”,讨论女性迁移与城市融合过程中的性别差异问题。会议认为,迁移过程是分配稀缺资源的过程,也是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和分工调整的过程,该过程伴随社会性别的烙印(钱伟,2006)。中国社会科

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进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表明，性别建构下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性别的建构，尤其是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一些优势位置，性别成为流动的天然屏障”（陆学艺，2004：180~211）。

然而，这些关注尚不够充分。在21世纪初中国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等诸多大型调查以及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尽管存在性别变量，然而将性别作为核心概念解释流动现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关女性阶层的论述也比较少见。这使我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会想起吉登斯的判断：“多年来，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性别盲点——仿佛女性是不存在的”（安东尼·吉登斯，2003：376）。

事实上，国内学者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相关研究一致表明，同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处于弱势处境，而且承担更大风险。沈渝（2010）认为，进城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期待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仍然是弱势群体。王峥（2008）通过对山东济南、青岛、临沂和聊城等城市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性别不同的农民工在就业年龄、收入水平、劳动保障方面存在差异，但相比之下女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临诸多不利。总之，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性别与阶级、种族是导致当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最重要、最普通的三种机制（李春玲、吕鹏，2008：186~187）。

因此，对于中国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国内关于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研究和水库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在这里只对前两方面的研究现状加以梳理。

1. 心理学对社会适应的研究

心理学主要从个体视角研究社会适应，探讨个体社会适应的

心理素质、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问题。

有心理学家认为,社会适应所需要的心理素质被称为“社会适应性”(陈建文、王滔,2003;陈建文、黄希庭,2004),但是社会适应性由哪些因素构成则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应该从以下因素加以考察:自我的激发、自主性、自我系统的开放、信息的包容、自我控制调节、环境控制和压力应对等。而且它们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刘立新,200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适应是人们在长期社会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征,在人们适应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它影响个体对社会压力的感受和理解,决定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适应社会。他们认为,对于社会适应的结构应该从以下四个维度概括: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和心理弹性(陈建文、黄希庭,200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适应是指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个体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林崇德等,2003:1068)。根据该定义,个体的社会适应包括两个方面:观念(或心理)与行为。据此,心理学家一般将个体的社会适应操作定义为两方面:外显行为(如学习成绩、行为问题等)和内隐问题(如抑郁、主观幸福感等)。

关于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的实质就是社会适应;而另一些人则反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社会适应论观点(陈建文、王滔,2004)。还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仅仅指没有心理疾病,还指个人在与环境达成协调的基础上,能够为自我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利的心理空间。这里强调的是个体与环境的某种和谐平衡,而这种平衡既是社会适应的心理功能,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之一(赵丽丽,2008a:12)。

2. 社会学对城市适应的研究

(1) 概念界定

《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并无“适应性”一词,与之比较接近的是“同化”与“调适”。但是在一些学者看来,适应不是简单地被

同化，从字面上看，同化有消极、被动之含义，而适应比同化更具积极主动性，因此调适更加接近适应的本意（朱力，2002）。《社会学辞典》对“适应行为”的定义是：个人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体通过社会化，知晓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与社会要求一致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与性别，在社会交往及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动，人的一生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王康，1988：352）。

在国内学者对不同群体（流动儿童、独生子女、农民工、异地求学大学生等）进行的“适应性”研究中，衍生出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社会融入/融合（social inclusion）、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等概念。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

一些学者将以上概念区别使用。有学者认为融入是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杨菊华，2009），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2006）。还有学者认为，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能与城市当地人和谐相处（张肖敏，2006：5）。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基本一致，只是在应用和概念界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强调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性，社会融入较多地被用于社会福利研究，与社会排斥是一对相斥的概念，强调移民的平等性。社会适应强调的是移民的主动性（陆淑珍，2012：11）。

有学者并没有将适应与融入（融合）区别对待，而是将其视为同一过程，用社会融入替代社会适应，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符平，2006），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并无显著区别（范晓光，2008）。还有学者分析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适应，得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方面的结论（张文宏、雷开春，2008：119；杨菊华，2009：20；刘建娥，2010）。

（2）城市适应的维度

城市适应由哪些维度构成？诸多学者认为其是个多维度概念。

两维度城市适应：生存适应和发展适应。生存适应包括工作生活适应、经济适应、居住环境适应；发展适应包括价值观、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研究者从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视角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进行比较，认为个人因素对适应起到重要作用，制度因素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积极作用（郑梓桢等，2011）。

三维度城市适应。有学者把城市适应分解为三个维度（朱力，2002；张海波、童星，2006a）：经济、社会和心理。还有学者将每个维度进一步分解，认为经济层面适应包括相对稳定的就业、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社会层面适应包括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心理层面适应包括归属感和价值观两方面。许传新（2007b）将城市适应操作化为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生活适应等方面。目前，关于三维度城市适应的研究已经出现一些成果（李培林，2003；杜鹏等，2008，钱文荣等，2009）。

四维度城市适应。风笑天（2013）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四方面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研究。马凤鸣（2012）则认为社会适应要从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文化适应四个维度进行测量。

除了对城市适应进行多维度分析之外，还有学者认为移民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朱力（2002）的研究认为，经济层面的适应、社会层面的适应和心理层面的适应是依次递进的关系。经济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心理层面的适应属于精神领域，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心理和文化方面的适应，才是流动人口完全适应城市社会的标志。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需要满足物质上城市人、社会上城市人、心理上社会人的三个条件（李强，2004：75）。

结合以上学者们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农民工告别广阔的农村天地、来到繁荣的城市后，要想真正地适应城市生活，被城市文化所接纳，首先应该找到工作，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以保证自

身的生存。这不仅是每个个体的生存前提，也是外来者立足城市的基本条件，此乃经济层面的适应。其次，外来者更要形成与当地人类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农民工进一步适应城市生活的体现。最后，这种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会影响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其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进而在观念以及情感上找到归宿，在心理上获得认同，此为心理层面的适应（田凯，1995）。总之，城市适应是外来者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调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过程。

（3）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与心理学家关注个体的研究视角不同，社会学家同时从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以及个体微观层面上寻找原因，认为影响因素涉及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家庭婚姻、购房能力与住房条件等）、就业状况（职业与收入、务工时间）、土地权利、制度安排、社会心理等。

微观上看，既有研究认为，个人特征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基本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城市适应的影响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续田曾，2010；段志刚、熊萍，2010）与“U”形关系（王桂新等，2010）两种；性别因素的解释力可能因为其他变量的引入而消失（张翼，2011）。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会说当地话、在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而社会排斥及网络资源对于社会适应也会产生影响（马凤鸣，2012：148；渠敬东，2001）。总之，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赵延东，2002）以及工作经历（曾旭辉，2004）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宏观上看，有学者认为，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原因是制度性因素。李强（2002）、潘泽泉（2004）分析了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起到的阻碍作用。

（4）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要使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尽快使其实现市民化、城镇化，